

陕西抗战记忆丛书

# 陕西抗战事件

陈答才◎主编 方海兴◎编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 抗战精神 永放光芒

姚文琦

陕西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且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陕西的爱国军民无论在陕甘宁边区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一直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英勇杀敌，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业绩永载史册，民族精神将世代相传。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地处西北的三秦儿女和全国人民一样，被日军的疯狂侵略所激怒，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9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东三省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在学生中成立反帝大同盟组织，将反帝特别是反日斗争和日常斗争、拥护苏维埃运动结合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从苏区到国民党统治区，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领导下，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而且组织了抗日武装力量。他们矢志抗日，誓言宁愿战死，不做亡国奴。强烈要求开赴抗日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收回国土，以雪国耻。

1935年12月，北平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陕西，省城西安的学生冲破国民党高压政策的压制，走上街头，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壮举，勇敢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西安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张学良、杨虎城果断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使陕西政治气象焕然一新，陕西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民主空气最为活跃的地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结束了反共内战，对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革命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7年1月17日，中共中央进入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总后方，全国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陕西省委适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陕西省委广泛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同消极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不懈的斗争。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直接参加或配合友军奔赴抗日前线，与日军血战。三秦子弟以血肉之躯，阻止了日军西进步伐。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陕西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一个是陕甘宁边区以外的国民党统治区（陕南、关中及陕北部分地区）。抗战中，陕西军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坚持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为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在这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培育了光芒四射的延安精神，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这里，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师抗日，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迎来了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驻守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在府谷至宜川的千里河防上，阻击日军，保卫了边区；在这里，培养造就了大批干部，他们成为后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骨干。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示范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陕西国民党统治区既是抗战的大后方，又是抗战的前线。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部分由三秦儿女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第九十六军、第二十二军、第十七军、第九十八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出师华北，英勇杀敌，保家卫国；驻守在绥蒙陕边界、宜川、韩城、合阳、大荔、朝邑、潼关黄河沿岸的陕军各部，形成铜墙铁壁，阻击日军，使日军无法西进，保卫了西北、西南的安全；在国民革命军其他部队的三秦儿女奋战在大江南北，奋勇杀敌，立下了赫赫战功。由于陕西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日军对陕西国统区及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无差别的轰炸，使陕西军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但是陕西军民不畏强暴，为保卫陕西，保卫黄河，保卫国家，积极参军参战，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将永载史册。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有3万多青年参加八路军，民众缴纳爱国公粮100多万石，支前154万多人次，组织150多万头牲畜运送物资，做军鞋20多万双。抗战时期的陕西国统区约有937万人，其中训练壮丁160万人以上。按当时陕西总人口计算，不到9人就有1人应征入伍，占总人口的12%。其中1942年到1945年直接送往中国远征军的兵员为63589人。

抗战中，陕西由于特殊的政治、地理因素，成为日军攻击和飞机轰炸的重点。日军空袭陕西的飞机大多是从运城、临汾、太原、武汉、包头等机场起飞。轰炸的范围遍及陕西55个市县镇，西安、延安、宝鸡、潼关、安康等地为重点。从1937年11月7日日军轰炸潼关始，到1945年1月4日日军最后一次轰炸安康，其间日机共轰炸陕西560余次，投弹1.36万枚，炸死百姓9047人，炸伤7015人，

炸毁房屋 43825 间，民众财产直接损失 982.5 亿元。其中一次死伤在百人以上的城市有西安、延安、宝鸡、安康等。遭受轰炸最为严重的为西安市，日机轰炸 147 次，死亡 2719 人，伤 1228 人，炸毁房屋 7972 间。

日军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进行了轰炸，据 1946 年 3 月 10 日延安《解放日报》文章披露，1938 年 11 月 20 日，日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到 1941 年 10 月最后一次轰炸，据统计日机共轰炸 17 次，投弹 1690 枚，炸死 214 人，伤 184 人，炸毁公共房产 1176 间（不含教堂的 169 间和礼拜堂一座），民房 14452 间，毁坏粮食 34.4 万斤，其他间接损失合边币 28.21 亿元，按 1945 年时值约合法币 1.5799 亿元。

抗战时期，主要由陕籍青年组成的国民革命军之孙蔚如统领的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高桂滋第十七军，高双成第二十二军以及冯钦哉第二十七路军，武士敏统领的第九十八军，王劲哉率领的一二八师等三秦子弟组成的几支部队，东渡黄河，置身华北、中原等抗日前线，或与八路军配合，或独立作战，奋勇杀敌，抗击了大量的日军、伪军。抗战中，牺牲的陕籍军民达数十万人，涌现出无数动人的英勇事迹，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乐章。

《陕西抗战记忆》丛书包括《陕西抗战将领》《陕西抗战遗存》《抗战中的陕西民众》和《陕西抗战事件》，太白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再现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抗战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告慰在抗战中牺牲的千千万万英烈。

抗战英烈，永垂不朽！

抗战精神，永放光芒！

# 目录 / CONTENTS

第一章 陕北窑洞里召开的战略转折会议	/ 1
第一节 “哀哉中华 其亡其亡”	/ 2
第二节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的确立	/ 11
第三节 西北抗日力量的大联合	/ 23
第二章 西安捉蒋翻危局	/ 34
第一节 穷途末路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 35
第二节 临潼兵谏	/ 52
第三节 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	/ 63
第三章 抗战初期各战场上英勇抗日的陕军	/ 72
第一节 八十四师高桂滋部的对日作战	/ 72
第二节 三十八军孙蔚如部的对日作战	/ 88
第三节 冯钦哉、王劲哉部的对日作战	/ 101
第四章 中条山的铁柱子	/ 116
第一节 血战永济	/ 117

第二节	坚守中条山	/ 140
第三节	喋血中州	/ 157
<b>第五章</b>	<b>日机轰炸陕西与陕西军民的防空战</b>	<b>/ 179</b>
第一节	日机轰炸陕西概况	/ 180
第二节	日机轰炸西安简述	/ 183
第三节	日机轰炸延安简述	/ 194
第四节	日机轰炸陕西其他地方简述	/ 206
第五节	陕西军民的防空战	/ 219
<b>第六章</b>	<b>千里河防保卫战</b>	<b>/ 226</b>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河防保卫战	/ 226
第二节	国民党军队的河防保卫战	/ 243

## 第一章 陕北窑洞里召开的战略转折会议

1935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继吞并中国东北、攻陷热河后，日本军国主义又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面对华北山河瞬息万变的危急形势，中国人民被迫发出了最后的吼声，全国抗日救亡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这年年初，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于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年底，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正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在陕北瓦窑堡窑洞里召开的这次政治局会议是年初遵义会议的继续，同样具有战略转折的历史意义。其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首先在陕西地面开花结果了，集家仇国恨于一身的张学良东北军、陕籍爱国将军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与中国工农红军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实现了大联合。历史表明，正是西北抗日力量的大联合强有力地扭转了当时中国历史的走向，陕西也当之无愧地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策源地与发祥地。



## 第一节 “哀哉中华 其亡其亡”

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侧的岛国日本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在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上，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友好与和睦的。然而到了1868年明治维新后，具有浓厚军事封建传统的日本主动顺应国际潮流，效法西方，实行资本主义改革。在促进日本近代化发展的同时，也迅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蕞尔小国日本遂逐渐成为世界东方战争的策源地。

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公元8世纪后半叶起，伴随着日本封建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征战杀伐为职业，带有浓厚的宗教意识和主从依附特征的武士阶级不断发展，并逐步成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1192年，武士首领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标志着日本第一个武家政权的诞生。日本武家政权素有海外掠夺的传统。16世纪末，日本的实际统治者、武士首领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即提出了征服朝鲜、占领中国、称霸东南亚及印度的“大日本帝国”的构想，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企图假道朝鲜侵略中国。只是由于中国政府出兵援朝以及朝鲜军民的顽强抵抗，日本的这一构想才化为泡影。到了近代，和中国一样执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日本也同样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以下级武士为中心的改革派掀起了“倒幕维新运动”。1868年，倒幕维新派推翻了最后一个武家政权——德川幕府，建立了以明治天皇为中心、由下级武士掌权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府。新的天皇政权实行“明治维新”，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开始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由于此次资产阶级变革的不彻底性，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大量的封建因素得以保留，使得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进程带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先天的畸形性，从而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具体而言如下：

第一，明治维新后确立起来的绝对专制的近代天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产生和推动其发展的根本保证。第二，天皇治下的军部势力是日本军国主义生存和发展的主体。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军队的权力被推到了能够左右国家全局的地步，政府不能控制军队，军队却可以左右政府。特别是随着后来对外侵略战争的扩大，军队全面介入了国家外交、内政的各个领域，遂使军部成为独立于政府、议会之外操纵国家政权的政治势力，从而形成了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军人政治。第三，畸形的民族文化观念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灵魂。在倒幕和维新运动中，新兴资产阶级与下级武士结成了改革联盟，一大批下级武士掌握了国家的政治航向。他们用传统的封建武士观念指导国家，致使日本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诸如“大和民族优秀论”“日本乃万国之本的国家”等观念和人性扭曲的武士道精神进一步泛滥开来，从而为军国主义的猖獗打开了方便之门。第四，先天不足的畸形经济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动因。日本国内市场极为狭小，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极为严重，原始资本积累的对外掠夺性极强。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先天不足的缺陷与迅猛发展的工业化对于市场、原料需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为解决这一难题，日本不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而这又反过来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快速发展。上述种种因素的不断强化，遂使日本成为世界上典型的极富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军国主义打算对朝鲜半岛和东亚大陆进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即已萌芽。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日本开始连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以战争掠夺的方式来解决本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原始积累问题。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从清政府手中勒索白银五十万两；甲午战争中，向战败的清政府共计索得相当于本国1895年财政收入四倍还多的二点三一五亿两白银的赔款；随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日本又从中国的赔款中分得白银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两。巨额的战争赔款收入，一方面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进

一步强化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

在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发展的情况下，适应其对内独裁统治、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19世纪20年代中期日本法西斯势力首先在军部应运而生，并成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导力量。随着法西斯势力的日益崛起，一战后因中国人民反帝斗争高涨和欧美列强重返亚洲争夺而一度受挫的日本大陆政策再度强化，并产生出了日本企图称霸世界的总构想。

1927年4月，日本政坛发生变动，出身长州军阀的田中义一大将出任首相兼外相，这标志着军部直接控制了日本的外交。田中内阁决定不择手段地维持中国的分裂并攫取满蒙。6月，针对中国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势如破竹的形势，日本外务省特地召开“东方会议”以制定对华政策。会议出笼的《对华政策纲领》赤裸裸地表露了日本对华动用武力和以中国的满蒙地区特别是东北为重心的强硬政策。以此次会议为起点，日本军国主义者大大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27年5月，蒋介石下令继续北伐，日本急忙出兵山东。1928年4月，第二期北伐开始，日本再次出兵山东，并制造了济南惨案，企图控制山东，阻挠国民党北伐。然而蒋介石却以完成“北伐”为由，置日本的侵略、屠杀于不顾，提出了“不抵抗主义”。1928年6月，日本在沈阳郊外的皇姑屯密谋炸死他们认为还不够“听话”的张作霖。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是日本执行新一轮对华侵略政策、挑起新的对华战争的起点，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的阴影正在一步步逼近。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和蒋介石发动的反共内战接二连三上演。有鉴于此，再加上西方国家陷入严重经济危机无暇东顾的大好时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首先将中国的东北收入囊中。1928年年底，当竭力阻挠张学良易帜的图谋失败后，日本军部更加紧策划武力夺取中国东北的行动，东北上空随即乌云密布、山雨欲来。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自然也波及日本，这不能不使原本就认为必须解决地域狭小、人口众多、资源匮乏问题的众多日本人更加急切地赞成向外扩张的主张。而向外扩张，日本人最看好的就是中



国东北。因此，日本政要及各色人等到处公开演讲，发表文章，宣称解决日本目前经济困难局面的根本政策不外乎是向中国满蒙扩张，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而在这个问题上更为激进的则首推日本军方。随着1930年日本军方在宪政辩论中取得了干政的舆论基础，随着由日本部分激进校尉级军官为核心组成的极端军国主义组织“樱花会”的诞生，一个日本军人为所欲为的时代迅速到来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不宣而战如期而至。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都没有足够的抵抗决心。于是在随后的四个月十八天内，日军就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相当于其本土面积三倍的辽阔领土，为其后向关内扩大侵略战争取得了前进基地。拥有了如此巨大的胜利果实，关东军的对华强硬和冒险政策遂被日本舆论看作是先见之明而备受推崇，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逼迫和侵略由此已再难以动摇。九一八事变标志着远东军国主义战争的策源地业已形成，它和德、意法西斯发动的欧洲战争一起，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显著时代标志。

吞并东北之后，经过权衡利弊，日本决定采取炮制傀儡政权、实行以华制华的政策，以达到既可混淆国际视听、掩盖侵略行径又可长期占领中国东北的目的。为此，日本首先策动东北各地汉奸宣布独立，拼凑各省伪政权；接着又搬出了清朝废帝溥仪，于1932年3月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从此，日本开始了在中国东北长达十四年的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如此大面积的国土沦丧，人民遭受的苦难与国家蒙受的耻辱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上都是空前的。银行家章乃器回忆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思想状况时说：“我们在不久以前，还在欢呼北伐的胜利，以为祖国从此可以转弱为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为期不远，我们这样生活在租界的人也可以不再受外国人的轻视、侮辱了。孰知大好形势突然逆转，国家又濒于危亡，悲痛的心情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原定在10月10日召开、后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推迟至11月间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宁方）宣言也不得不承认：“数载以还，建设之实效未彰，国力之增进犹鲜，最近复来此空前之外侮，

凡举国同胞之所责难于本党者，本党诚无所自遁其责任。”但是国民党领导人中应由谁对此负责呢？反蒋派认为应由蒋介石负责。孙科说：“自从十五年本党北伐成功后，中央党权受了军事独裁势力之支配，弄成今日万恶军事独裁之局面。故本党北伐虽然军事胜利，但同时本党政治反趋失败的地位。”邹鲁也指出：“东北四省何以会沦陷，华北诸省现在又何以会岌岌可危？这都是卖国的蒋介石不抵抗的结果。”蒋介石则认为反蒋派才是罪魁祸首：“当时本党同志如果能本总理大公无私之心为心，则国内事变不致发生……即九一八事变与东北之失陷，亦无由而起。”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祖国大片山河沦丧和国民党政府的屈辱退让，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于是，全国各地民众化悲愤为行动，矛头直指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政府，掀起了1927年后好几年没有出现过的全国规模的爱国救亡运动。

尽管南京政府对日本的人侵步步妥协退让，但早已制定侵吞中国的既定国策的日本绝不会因此而止步。1932年1月28日，就在国际联盟调查团抵达东京的前一天，为转移欧美列强对其吞并中国东北的注意力，日本军队又在上海地区预谋制造了袭击中国军队的事件，当地驻军十九路军被迫奋起反抗。5月15日，日本一批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袭击了首相官邸及警视厅等重要国家机关，杀死了首相犬养毅，组成了斋藤实新内阁。新内阁以确立所谓“国防国家体制”为宗旨，将日本政体的法西斯化进一步推进。在此情况下，日本关东军决定“调头把圣战指向热河省”。是年底，日本从国内调遣第六师团到东北，准备用于进攻热河。在一切准备就绪后，1933年1月1日晚，日本华北驻屯军蓄意在山海关制造事端，次日上午借机发动进攻，并于3日下午攻陷山海关。2月下旬，日军分三路攻击承德、赤峰和多伦，沿线的中国守军大多不堪一击，纷纷溃退。特别堪称奇异者，当数3月4日一支一百二十八人的日军小分队就攻占了热河的省会承德，热河省随即被宣布并入“满洲国”。前后不过十余天，热河八万大军不战而失全省的败绩再次激起举国愤怒，蒋介石乘此逼迫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辞职。据张学良后来回忆：

他和宋子文、蒋介石一块儿谈话，蒋介石对他说：现在船上有三个人，这个船上不能载三个人，总得有一个先跳下去。我说，要跳下去，那我先跳。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怀着愤懑的心情和难言的苦衷，安排善后一切；将所部东北军编为四个军，分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任军长，归北平军分会指挥。

日军攻陷热河后，为逼迫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城下之盟，达到划长城为“国界”的目的，随即挥师南下长城各口，华北局势陡然严峻。面对全国舆论的高压，蒋介石也感到需要对付一下日军的人侵。3月上旬，蒋介石北上石家庄、保定召集会议，调兵遣将。从3月5日至5月25日，中日双方在长城各口及平榆大道以北地区进行了一场历时八十余日的大战，史称“长城抗战”。3月初至月底，双方在长城东段的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罗文峪、界岭口、义院口展开争夺。其中的古北口战役尤为激烈，被日军认为是“激战中的激战”。陕西籍将领关麟征、杜聿明指挥第二十五师参加了此役。在战斗中，关麟征被炸弹炸伤，浑身是血仍力战不退，终于击退了敌人，占领了高地。关麟征因古北口战役中的力战而获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当时曾撰写社论《爱国男儿，血洒疆场》以贺其功。1934年春，田汉以古北口保卫战为背景写成了影片《凤凰涅槃》的故事梗概，并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随后田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夏衍将其继续创作完成，并指导拍成影片《风云儿女》。1935年，音乐家聂耳将《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成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电影播放后，《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在祖国的大地上迅速传唱开来，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作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响彻华夏大地，激励着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最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这首反映中国抗战精神的战歌还走出了国门。1944年，美国好莱坞米高梅公司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抗日的故事片《龙种》，该片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插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国务院特批将《义勇军进行曲》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当时，

陶行知在埃及金字塔下听人唱过这支歌；梁思成在美国讲学时，看见一个十来岁的美国孩子边骑自行车边吹口哨，吹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象征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中华民族的坚强斗志和不屈精神永远不会被磨灭。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从而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长城抗战中的喜峰口之战则尤其体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概，此役中二十九军官兵几度使用擅长的大刀片展开近身肉搏，毙伤日军三千人左右。这是中日交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给日军以歼灭性的打击，也是长城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唯一的一次胜利。捷报传来，大大振奋了全国人心。1933年3月19日的天津《益世报》称：“喜峰口这次胜仗，我们叨这班英雄的光，又抬起头来了，使我们中国人还可以做人。”当时的日本报纸亦曾哀叹：“明治大帝造兵以来之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此战也使宋哲元军长统率的二十九军大刀队威名远扬，由著名的音乐工作者麦新写成于七七事变后、广为传唱的《大刀进行曲》就是以此为题材创作的。随后，双方又先后在长城东段南侧的滦东、南天门和长城以南的冀东作战，参战的中国官兵亦曾打出了多场使日军心惊胆战的战斗，但早已确定对日谋求停战、对内加紧剿共的国民政府甘心屈辱妥协，于5月25日接受了此时已无力扩大侵略华北的日本提出的停战谈判的条件。5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军事条约《塘沽停战协定》，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这等于认可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四省的非法侵占；协定还使冀东二十余县、五千平方公里的国土事实上脱离了中国的主权范围，从中国领土上割裂出去，从而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塘沽停战协定》无疑是蒋、汪国民政府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的产物，它标志着长城抗战最终以妥协而告结束。

《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只是暂时中止了日本对关内地区的军事进攻，没有也不可能阻止其进犯华北的念头。其时，日本感到须在北方加强对苏备战，难以抽出更多兵力入侵华北，而且武力入侵华北有可能要引起国际战争；但中国政局动荡不已，北方军队分属不同山头且都对蒋怀有二心；如果日本借席卷东北之威大军压境，再施以反间谍略，定可不经真正的战争而达到建立傀儡政权、分离华北的目的。本着这一考虑，1933年中到1935年初，日本政府与军部经过近两年的酝酿推敲，最终确立了在中国华北“根绝排日”“削弱国民党的势力”和“与中央政权”分离的政策。接下来，日本就开始着手推进以分离为目标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

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共同商定：为使华北五省（即当时的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省）脱离南京政府、作为和满洲国保持密切关系的一个自治区域，首先要以制造事端作为提出要求的借口，将国民党势力逐出平津及河北省，最后达到黄河以北事实上独立的目的。为此，日军于五六月间相继制造了“河北事件”与“张北事件”，然后提出苛刻无理的强大要求逼迫冀察地方当局接受其条件。在南京政府继续对日妥协的总政策下，中国方面相继签订了满足日方要求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该两协定是日本分离冀、察两省并由此入手分离华北的一个重要步骤，不仅使日本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部分主权以及实际控制了察哈尔省的北部地区，也大大削弱了中国在华北的军事力量，使华北几乎成为非武装地带。

随着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撤出，华北部分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日本趁机加快分离华北的步伐，积极策划华北“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国，在关内制造第二个“满洲国”。日本分离华北的活动是由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共同导演，由驻屯军参谋人员及驻华武官穿梭于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等地具体策划。10月间，土肥原带着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分治华北的使命来到华北，他的具体设想是：第一步说服并切实掌握



殷汝耕；第二步在华北地方首领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中选择突破口；第三步再将其他三人包括进来。土肥原按此设计展开了具体工作。他先是将领导华北“自治”运动的希望寄托在当时滞留华北的失意军阀吴佩孚等人身上，在未能奏效的情况下转而做阎锡山的工作，阎锡山没有人套后则开始做宋哲元的工作，并限令宋于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将以五个师团的兵力进攻河北，六个师团进攻山东。关东军还出动陆、海、空三军频频向宋哲元示威，华北上空仿佛已重现九一八事变前夜那种浓烈的战争气氛。与此同时，土肥原还操纵汉奸殷汝耕等以民众团体的名义制造华北“自治”舆论。一时间，华北“自治”的叫喊声甚嚣尘上。后在南京政府军事、外交挽救措施的作用下，在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华北民众的强有力声援及英、美两国表示关切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指示关东军暂缓华北“自治”。于是，万众瞩目的“11月20日”这个最后期限在静悄悄中过去了，原定11月25日、后改为29日发表的《华北自治宣言》也未能出台，日本策动华北自治的阴谋最终破产。但局势并没有缓和下来，11月24日，土肥原策动殷汝耕在北平近郊的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公开宣称“脱离中央”。两天后，又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占河北省面积四分之一、有六百万人口的冀东就此完全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南京政府制止华北自治宣言的发表和华北自治政权的出现是一个胜利，也勉强算是达到了保住平津及河北的目的。但由于蒋介石此时仍没有下对日作战的决心，同时也意识到日本对于策划华北自治运动的失败绝不会善罢甘休。权衡利弊后，为部分地满足日本人的愿望，南京政府于1935年12月12日决定撤销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和北平军分会，另设“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综理冀察平津两省两市一切事务。“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建制上虽仍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但事实上是一个半独立性的畸形政权，其成员中混杂着不少亲日人士。当时就有人指出，如此“冀察政务委员会”不过是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扩大，华北国土的沦丧已是旦夕之间的事情了。从此，华北